

神圣
忧思
录

大 学 文 学 报 告 秀 优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诗虽不文，道出了看戏时对戊戌变法的失败共怀“叹息”之情的心境。没过多久，康先生便去世了。或许，在那以后，他正是每天吟着这样的诗句，走完了他最后的不多的日子。他肯定很欣慰地想：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历史自有公论”。

神圣忧思录

——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

张 敏

我们从来都有前人递过来的一个肩膀可以踩上去的，忽然，那肩膀闪开了，叫我们险些儿踩个空。

——作者题记

鲁哀公十六年，孔子要死了。

他拄着拐杖倚门而唱：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唱着唱着就抽噎起来。七天后，他死了。

他一生到处备受冷眼，累累若丧家之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到头来还是凄凉而死。然而奇怪的是，那原已衰微的古老文明竟靠着它猛力地一推，又滚滚碾过了两千年！

我们评价不了孔子这一推的功罪，却朦胧地感觉到，一个巨大文明的延续竟如此依赖于传递者的伟力，实在是一种很神秘的历史现象。

这运载、传递文明的伟力，应该是极神圣的。我们是仰仗这

神圣的传递力才成为这个星球上拥有最悠久历史的民族的。

曾几何时，历史已成重荷，文明也显古老，我们欲求自强不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那文明传递的神圣伟力，那如孔子作为教育家的“不怨天、不尤人”的执著精神而今是否仍然存在？

一 文明的断裂

望子成龙众生相

儿子六岁了。想到这只知贪玩的小子从此就要背上书包这副“枷锁”，我不免心头有些黯然。是人都得经过这座文明的“炼狱”，我是懂的。然而，出去跑了一阵入学的门路才知道，我对如今北京城里上小学的艰难，竟同傻乎乎的儿子一样浑然不知。

火热的七八月呵，不仅对高考生来说是“黑色的”残酷，对于那些从“十月怀胎”起就一往情深地进行各种名堂的胎教的年轻父母们来说，也是焦灼甚而可怕的。

年年每逢此刻，在教育神殿的门槛前，匍匐着数不清的颤悸的心。

似乎只在这一刻，这殿堂的神圣才是无与伦比的。

我也到了该领儿子朝它跪去的时候啦！

恍惚间，当年父亲牵我第一次上学的情景朦胧浮现，记得我蹦蹦跳跳地窜进校园，那校门好像平常极了。

如今轮到我们这一代领儿子去进哪家校门，就非同寻常了。它不仅将决定孩子今后的命运，而且仿佛还关系着家长的荣辱——学校是分重点非重点的，这区别似乎是宿命地把往后的前程、等级、贵贱都在这一次选择中基本敲定了。每一位年轻的家长都深

信，给孩子挑一所“重点”就像他们自己重新选择一次人生。但恼人的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偏又不像高考生那样可以硬碰硬凭成绩分优劣，而是由户口决定的——学龄儿童按户口所在地划片就近入学。于是早在每年一二月间，北京城里便有一场转户口的风潮悄然开始了。

这真是一幕充满机智、狡黠乃至谎言伎俩的滑稽戏。偶闻其中一鳞半爪，便叫我为之惻然。

有“先见之明”者，早在腹中成胎之际，便把户口落进亲友家中，待孩子生下便拥有了“片内”户口，于是就像前清吃“铁杆庄稼”的旗人似的无忧无虑了。

“片内”有亲戚的主儿其实不必这等性急。待孩子长成，再同亲戚去换房站办理户口和住房证的交换手续，但并不搬家，“片内”户口照样唾手可得。

只苦了“片内”无亲无友的了，那就得付出些代价。“片外”某君以四十平方米住房换了“片内”二十七平方米，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牺牲十三平方米的住房去换个孩子的“重点户口”，虽说亏得狠了些，也是情愿的。

还有更惨的。黄城根南东路口有个售货员，为挤进“片内”，百般换房，不料换了一家住私房的，他把公房让出，那边却不准他再进私房，最后竟落得在“片内”一个门洞里栖身。可怜天下父母心呵！

真换房的、假换房的、认干亲的、假离婚假结婚的。北京人什么招数想不出来？一位母亲领着孩子到某重点小学哭诉，孩子他爹惨遭车祸身亡，只好寄养姨家，虽无“片内”户口，学校怎忍推出？入得学来，那孩子才说：“我爸活得好好的。”

自然，这些都还是平民的招数，有的人是不必要这些雕虫小技的。可户口对老百姓来说，却非同小可，乃至某单位因施工将大门改在另一条街上，竟引起轩然大波——门牌的移动，立即发

生划片归属的变异。

也自然，重点小学的教师们是深知其中奥妙的。每年二月后，需得挨户核实户口和人头，近年来也不得不学点福尔摩斯的本事。每当招生季节随着酷夏来临，重点学校门前便车水马龙，水泄不通。教师们都作好充分准备来迎接这一年一度的灾难和“战争”。家长们围着他们央求哀告，哭的、吵的、闹的、作揖的、要下跪的、摔户口本的、赖着不走的。人们把一颗颗滚烫的爱子之心蘸着辛酸的泪水捧给他们，也用各种精心编制的甜言蜜语、许愿承诺、捶胸顿足、瞎话谎言来浸泡他们、软化他们、激怒他们；右邻左舍的各种关系户、菜店、房管所、派出所、煤气站、副食店、居委会等等，也都蜂拥而至，来索还对他们预先支付的种种人情、照顾和恩惠……

断不清的官司又移交到区教育局。家长们便又一拨儿接一拨儿朝那里涌去。局长像个见不得人的“通缉犯”，出出进进戴一副墨镜，就怕被人盘问：“您是某局长吗？”一旦被人认出，立即陷入重围。人们把他堵在办公室里，不让他做事，不放他回家，有的索性把孩子往他怀里一推就走。孩子在院里撒欢儿，饿了渴了也来闹他。教育局成了幼儿园……

教师和局长就是浑身长嘴也说服不了家长不要迷信“重点”，因为办“重点”的事实是路人皆知的。只是痴心的父母们并不知道，“重点”的承受力不是无限的，如此倾盆大雨地灌将进去，“重点”的优势便立即化为乌有。倘若大都市里那种在商店、地铁、公园、车站等到处叫人头皮发麻的拥挤状态一旦侵入宁静的校园，那么小学生上课这件极要紧的事，也只好像大街上挤车和胡同里排队上厕所一样讲究不得斯文了，这么一来，倒真的把重点非重点全抹平了。

其实，就在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正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奔“重点”的今天，北京市各区教育局却都在那里为绝迹多年的小学二

部制终于不可避免地要大面积卷土重来而一筹莫展呢。计划生育部门已经发出警报：从今年开始，建国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口开始进入小学。也许，它就像一场陡然涌来的洪峰，会将大地上所有的河道、沟渠、洼地全都涨满、挤裂、弥平……

西城区目前在校生四万五千余名，未来三年内将以每年一万名的幅度递增，到1990年预计要猛增到七万名。眼下提前开始扩建校舍的学校已经借用别处教室实行了二部制。而对大多数学校来说，无论新建扩建，还都既无资金又没地皮。

宣武区目前小学九百个班，到1990年将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个班。那里教育局的同志惊呼：“我们是在毫无准备的条件下遭遇这个人口高峰的，校舍奇缺，师资来源枯竭，这学还咋能办好？”

专家们也把人口压迫教育的危急状况，列为中国未来教育十大危机之首。

每一个盘算着自己那个“小皇帝”的锦绣前程的家长，或许就像洪峰尚未到达前的江河两岸的一木一石，对快要降临的灾难是漠然置之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虔诚地笃信着学堂神圣的教化功能和“师哉！侗子之命也”的信条，他们深信孩子只有送进去才会出息，他们把对未来的希望像赌注一样全都押在上面，决不去理会那些危言耸听之谈的。

我想，悲哀也正在这里！

麻木中的预警声

每年七八月间，当翘首以待却又胆战心惊的人们穿梭往来于各大、中、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他们密切相关的信息偏偏很少引人注目。那是一个很微弱的声音，但却年年必定夹杂在招生热潮中呼吁几声——

1986年8月14日《光明日报》的一则消息透露：“今年师院的生源比往年更困难……北京的优秀中学毕业生不报师范，不选

择教师职业的问题日趋严重。”

同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也以《师范院校为何依然门庭冷落》为题发表一篇调查：“‘帮我们呼吁一下吧，师范院校招生太惨了。长此以往，教育事业将不堪设想！’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作为培养教师的摇篮之一——北京师范学院的同志却对记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当着中小学的大门被滚滚而来的学生几乎要挤破的同时，师范学院这边却门庭冷落、一派凄清。在这冷热、盛衰之间仿佛公然宣称着一个荒诞的逻辑：越是希望子女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们偏偏越是看不起教育这个行当。在这逻辑后面似乎还暗伏着一个不祥的怪圈：社会的教育功能恰恰在生产着非教育的社会力量，继而形成一种自我窒息的反作用力，结果是人才创造得越多教育反而越萎缩。长此以往，望子成龙之辈们还会有什么指望？

我常常被眼下中国的各种怪圈弄得迷惑不解，诸如离婚越难反而离婚的越多，盖房越多城市里人的生存空间越窄等等，叫人摸不清船究竟是湾在哪里？但我相信，社会机制的紊乱，总有它合乎规律的根源。这怪圈，说到底规律对人类的报复。荒诞的逻辑一旦公然行世，恰恰证明了某种社会机制的荒诞，而这荒诞说不定正是真理的二律背反。

他叫田畅，父母都是教师。高中毕业时，他却以“这辈
子不吃教师这碗饭”的不容商量的坚决态度，向我们显示了一
颗早熟、隐痛、凉透了的心——

他太清楚中学教师这种职业在社会上的档次了。用不着别人向他宣传、动员。十六年之久的酸甜苦辣、耳濡目染，使一个教师的儿子在高考志愿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里，毫不迟疑地写道：“除师范院校外，其它院校都服从。”

他像躲瘟疫一样竭力躲开父母所从事的职业，这在有着子继父业的深厚传统的中国人看来，是否有些“叛逆”之嫌？

其实，世上没有比父亲更叫他敬重的人了。每当夜间，在那十二平方米的斗室里，父亲怕影响他和弟弟做功课，总是独自躲在角落里、戴着耳塞机、几乎是贴着荧光屏默默看电视。父亲总是等他们的功课做完了，才使用那张饭桌批改作业。这时他躺在行军床上瞅着父亲的背影，心里有股说不出的酸楚。

他的父亲，一个当年上海复兴中学的高材生、1957年北大地质地理系的本科毕业生、二十多年来发表过多本著作和译著的知识分子，竟落到连一张书桌都不能独自占有的境地，这是他这个80年代的中学生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父亲所经历的是一段叫他不能理解的历史：学地理专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通县农校教书，农校解散后，又转到顺义县一个公社的戴帽中学，整天领着学生深翻土地、夏收秋种、大办沼气；自己学的专业丝毫用不上，却是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俄语什么都教过。后来妈妈在北京幼师毕业，也到了顺义。直到父亲在那里任教满二十五年才回到城里，等待全家的却是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

他和弟弟就在那大人与小孩轮流分享饭桌、每晚拆桌支床的岁月里渐渐长大了。当他们哥俩终于都熬过十三岁时，那条难以企及的分房标准线居然也渐渐在望了——按照规定：中学教师人均三点五平方米以下、子女十三岁以上，且夫妇双方都在教育部门工作者具有分房资格。但就在这时，妈妈得癌症死了。小屋里剩下三个男人，人均平方米数重新突破三点五……

诚然，他是无力改变父辈的命运的。但如果给他选择的权力，他当然拒绝承袭父辈的命运。父亲在给他以知识遗产的同时，无形中也给了他另一种悲剧性的遗产：他不能走父亲的路。

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师找他谈话：“以你的分数，报考清华师资班和师院比较合适，不然，你就只能读大专了。”

他摇摇头，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北京建工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系。那是一个两年制的走读的大专，可同盖房子有关。呵，一个孩子的房子梦！

我们能责备他的选择吗？

他姓罗，做中学教员到70岁才退休。此刻，我同这位饱经沧桑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坐在静静的一隅，听他像是从极远处对我说——

如今教书先生没人干了，大伙儿都挺纳闷。其实要说缘故，也明明白白。人活着总得有个盼头，盼国家好、世道好，自个儿和家里人也好，活得不费劲，再长点能耐，做点正经事。有这么个盼头让他奔着，他活着就带劲儿了。

我是1912年生人。父亲一辈子做小职员，月薪二十一块大洋，一家人生活还算过得去，我还能读私学，十九岁小学毕业。成人了，总想独立，就去考中等师范，吃住都有着落了。毕业后做小学教员，挣四十五块钱。那时不兴长工资，终身就这四十五块。当时警察月薪是八块，去官府里办事也就二十多块，科长也没小学教员挣得多。中学教员的薪水还要高呢。

那天我和老友们聊起当年，人家都说知识分子清高。倒不是我们故意瞧不起谁，教书的人讲究洁身自好，不愿去钻营，也没那份能耐，只觉着凭知识吃饭挺如意、挺干净。浑身的穿着打扮，就那么回事儿，倒给了别人一种清高的印象。如今啊，你想清高还清高不起来呢！

我在小学教了七年后考上北京大学农学系。一边上大学，一边还教小学，自己供自己念书。读大学就是为了奔那个中学教员的职位。那会儿教员的身份可不像现在，多少人梦寐以求啊。当时考师范很难，一千多人去考，只取九十个，还能不优秀？你想

干还未必有那个福气哩！

这辈子经历了不少事，人生也算看得清楚。1940年以后，苦得很，正抗战，吃混合面，挣的钱只能够自个儿一张嘴。世道一艰难，教书的人就倒霉了。

解放后到这个学校，一口气又教了三十年，教不动了才回家。刚解放时，心气儿是向上的，待遇也不低于三十年代。1957年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就瘪了，后来闹“文革”，教师受的罪比谁都多，从此地位一落千丈。后来拨乱反正了，世道清明了，是不幸中之大幸，可是教师的地位，恕我直言，名曰升，实则降。其它行业的待遇上去了，教师上得慢。到现在，中小学教师究竟算不算知识分子，好像还是悬案。就是中教一、二级的老教师，月薪也不过百十块，还不抵大宾馆里的服务员。这到底是怎么个事？

反正我就知道一个理儿，教师的身份跌得太低了，这个国家就麻烦了。各行各业要是都比教书有利可图，那谁还肯教书呢？人人都看着当官油水大，都眼红权力，这事儿就崴泥了。你可别小看这股劲，一成风气，扳过来就难了。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歪门邪道，可教师不能歪。不歪是对的，不是错的。可你顶得住吗？像我们当年，社会那么污浊，自个儿还能清高，有那份高薪水撑着哩。如今你撑撑试试？拎着菜篮到自由市场一转，你自个儿就跌份了。话说回来，这副穷酸相，别人也不正眼看咱，也不待敬咱，整个社会都不正眼看教育。这么一来倒好，章程拧倒个儿了，学校办点子事得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求人给点施舍，给盖点房，像要饭似的，这怎么行呢？

亏待了教书的，要受报应的。人才中的上流甬想吸引过来。老北京有几所办出名气来的中学，像一中、惠文、贝满等等，当初都是靠待遇好把各中学棒的老师收罗去了。人同此心，情同此理。两种工作一个样儿的干，一个待遇高，一个待遇低，上哪儿？哪儿苦上哪儿？那是有条件的，得作出评价。自愿报名，给你戴朵

大红花，之后就不理你了，行吗？

人要不怕苦，不能老苦。

据悉，鉴于往年师范院校招生难的情况，今年北京市采取了一项特殊政策，即试行师范院校及师资班提前单独招生的办法。此项政策规定：志愿可以文理兼报，考试提前在5月初进行，凡是被各师范院校录取的考生不得再报考其他院校，未被录取的还有资格参加7月份的全国高校统考。

显然，这是一项对于考生来说既有诱惑又不带风险的明智的政策，它起码可以在全国统考之前把一批高考没有把握的高中毕业生吸引到师范院校来。据《光明日报》今年4月19日的一篇报道披露，往年冷寂的北京师范学院门庭若市，前往咨询的人们络绎不绝，达万人之多。

如今的高中生不那么简单。他们的狡黠有时是颇令人头痛的。招生部门已经发现某些不正常的端倪：不少考生表面上积极报了名，暗地里却做好准备到时漏考最后一课，这样即使他考得再好，也注定不会录取。他们竟然把这次师范提前单独招生变成了大考前碰碰运气、适应考场气氛、练练竞技状态的一次预演！

呜呼！各家自有各家的高招。中国有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对此退避三舍，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望而却步

师范院校的生源枯竭已急煞当局，殊不知，已经拢进大门来的一批师范生，还更叫人焦心呢！

师范生的分配去向理当然是到中小学做教师，然而，如今这在他们中几乎已被视为畏途。年年分配关头，师范生们都各“逃遁”有术，这情形我们在后文还有详笔。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昔日师道的光彩，是何以在当代青年心目中暗淡下去的。师

范生们决不讳言这一点。他们最可爱之处就是永远也学不会掩饰他们对一切的率真评价。

今年春天，我们在一些中学采访时，碰巧遇到了一批正在那里实习的师范生，有北师大，也有师院的。他们同我们在毫无戒备心和虚伪应酬的气氛中讨论了他们将要从事的职业。自然，需隐去姓名，以免麻烦。

女生 A——

“高考时我没报师范，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哭了。爸爸妈妈都在大学里教书，劝我，说女孩子当教师也算合适的。有机会再跳出来嘛。从他们身上，我多少知道一点当老师的辛苦。现在自己站到课堂上来，一站四十五分钟，好漫长呵！课上，一席话，课下不知要反复磨多少遍。辛苦不说，有病也没法请假。来这里实习，就看到不少老师兜里揣着病假条上课。这工作就像躺在一张橡皮筋编的网上，越坠越沉，似乎下面是个没底的窟窿。我真不愿多想它。反正拿通知书哭了一次，毕业后我更会大哭一场的。”

男生 B——

“我中学成绩一直很好，高考没考好。校长建议我第二年再考，后来不知道哪个老师替我填报了师范。我被录取，完全不是自己的选择。这次来实习，大家都提不起劲来，还生怕干得卖力，被指名留下。不过，中学教师的甘苦，这回真算领教了，工作哪有上下班之分？连走路都得琢磨学生怎么管、课怎么讲。干这活儿你还没法瞎对付，往学生跟前一站，好歹是个师长，稍微讲点脸面的人，总想干好。那你就受累去吧，有多大精力都得熬干！就这么辛苦，到头来还没人念你这点儿好。所以同学们都说，要没这趟实习，不到中学来瞧瞧，明儿分配了，兴许糊里糊涂还能去干；这么一瞧，说什么也不能去呀。”

男生 C——

“社会上只有一天重视教师，那就是教师节。什么好听的话都

让教师在这一天听个够，过了这时辰您就捎一边呆着去吧。当然也不光是说点好听的，还优待些其他商品，不过据说有的也是乘机推销积压物资。人心是杆秤，教师当真值几个钱，大伙心里都明晰。难怪这回我来中学实习，在资料室看书，听一旁有位老师问另一位：‘你怎么让那个学生报师范呀，他学习不是挺好的吗？’有回一个中学生还对我说：‘我哥哥学习不怎么样，想报你们学校试试。’你们听听，这种话叫我们师范生听了，能不难受吗？不过冷静想想，人家说的都是实话，咱也别气不顺儿，靠自己哄自己过日子！”

女生D——

“今年师范提前招生，倒是挺新鲜。不过我看靠这办法想招优秀生，也难。要是师范都招些低分生，那非恶性循环不可。你越掉价儿人家越瞧不起，越招不来好的还真越掉价儿。如今弄得我们这些读师范的也自觉矮人一截，好像比那些函大、夜大、电大还不如。老师真像一支蜡烛，把自个儿烧没了去照亮别人，对这种必定要做出牺牲的特殊职业不采取特殊政策，谁还肯干！不知道上面为啥算不过这笔账来？”

实习带队教师——

“我是八一级师范毕业生，因此我很能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我毕业实习那会儿也经历过这种幻灭的痛苦。在中学见到一位女教师，四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一样苍老，她那满脸的皱纹好像告诉我，这是一种多么销蚀生命的职业，而且是在极其平凡琐碎的过程中被悄悄吞噬掉的。我常想，对于今天这一代人来说，教师的辛苦和清贫也许并不是最难以接受的，最可怕的是在默默无闻的消耗之后仍然得不到心灵的慰藉。许多师范生并不惧怕这职业，怕的是中学里那种狭窄的、停滞的和窒息的环境和气氛，对个性特色及创造性的可容度太小，他们很想有所作为但施展的天地很有限，幻灭之后就想走，又走不脱。这就使后来者

望而却步。”

今天的教育事业，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批继承者。他们自私吗？觉悟低素质差吗？缺乏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吗？人们尽可以这样评价或责备他们。但是，你有力量改变他们吗？你的力量表现在哪里呢？难道就表现在师范招生时那慷慨激昂的动员和大张旗鼓的宣传吗？

是的，我们也很惊异。党的号召，思想动员，政治鼓动，都曾经是很有效的。它造就过一代良师，神话般地孕育过奇迹；但何以今天它会变得如此不中用，而至今仍被奉为唯一的灵丹妙药？我们甚至辨不清：究竟是时代在愚弄人，还是人仍要固执地愚弄时代？

二 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

——教书的工作为什么叫你那么醉心，醉心得连我们也想流泪。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苦吗？学校天地之小、学生管教之难、教师待遇之低，你乐的是什么呢？

——是啊，乐的什么呢？天知道。可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历史还记得他吗

郑怀杰还会等待那十年一次的聚会吗？倘若真有这聚会，他会流泪的。只不知这泪是欣慰还是伤感。

是的，也许只有这种聚会，才能叫人想起那段早被遗忘了的历史。三十年前，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梁在一个欢送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会上说：“解放后，大批工农子女入学，教师不够，你们的弟弟妹妹没人教。党希望你们留校教书，帮我们拉扯他们一把，凡

是考上大学的，保留学籍两年。两年后，你们再去读大学，好吗？”全市三千名毕业生自愿留下了五分之一，这六百多个都是优秀生，大多已被大学录取。郑怀杰也留下了。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把北京钢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塞进了抽屉，绝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终生的诀别。两年后，各大学都来函催促留校生快去报到，他又放弃了。三年后，他亲手把一个毕业班送进了大学，自己还舍不得走。这一年他入了党。十年后，在庆祝他们这些留校生任教十周年的宴会上，孙局长又来了，他说以后每十年都要聚会一次。那一次，郑怀杰觉得一切都得到了报偿，虽然那时并不高谈“奉献”。很奇怪，在社会上并不高喊奉献的年代里，偏偏人们奉献得极为心甘情愿。

别以为 50 年代的人都是“傻帽儿”，不懂上大学的要紧。起码，对于郑怀杰的父亲——留美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的鸟类学家郑作新先生来说，儿子天经地义是该享受高等教育的。为这，他同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妻子千方百计给了儿女们一个金色的童年和最优越的初级教育。他绝没有想到，竟是他最钟爱的长子郑怀杰，此生偏与大学无缘。一个博士家的长子甘愿做了孩子王，这事无论在当时多么平常，今天也会变得不可思议了。倘若人生再让郑怀杰选择一次，他会怎样呢？

这问题提得荒唐吗？不。你再听听郑怀杰后来的命运，便知道什么叫荒唐了。

他终于没能盼来第二次聚会。

来的却是整整十五年的苦难。1964 年四清一开始，他就被开除了党籍。罪名同 1957 年的右派如出一辙。他无意中曾对学生说，西方人主要吃肉蛋奶，揭发者给他加了个下联：中国人主要吃草茎籽。于是，他忽然发现愚昧是那样强大、冷酷、翻脸不认人。他原本就是为了清除愚昧才放弃了上大学的呵，结果愚昧反而收拾了他。他按月把党费装进一个信封，塞在枕头下面。“文革”一来，

他陷入了更深的地狱。一个星期要挨六十场批斗，真真是体无完肤了。当初让他拉扯一把的“弟弟妹妹们”，如今像牵牲口一样拉他去游街、用三角皮带抽他跳牛鬼蛇神舞。他跳着，心里却在想：我为什么要留下来送你们上大学呢……

然而，灾难一过去，他还得拼命送他们上大学。他当了校长，得抓升学率。他把教师、学生、家长都请来，亲自作示范讲公开课。他摸索出一套入学教育的新办法，给初一、高一学生注入强大的“第一推动力”。他还到处去张罗钱，为了给教师每月发点奖金、加班费，给负责学生早读的教师供应一碗豆浆、两个油饼……可是，有人突然对他说：你的文凭呢？没文凭你能算知识分子吗？怎么有资格当校长呢？于是，他在五十二岁的年纪还得去奔一张大专文凭。他当年那样轻易奉献出去的东西，如今也板着不容通融的面孔来报复他了。他原来早该是高级工程师或教授了，如今却同儿女一辈为伍去上夜大、函授什么的。

他还保存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只是纸已发黄，那“钢铁”两个繁体字也早就简化得让现在的大学生也写不囫圇了。

百叶箱的梦

睡去了，又醒来了。她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个小百叶箱洁白、亭亭玉立的轮廓。脚下是绿茵，身后是蓝天，红领巾像火苗儿在四周窜动……

人老了，偏多梦。半个世纪的往事纷至沓来，人影离乱。华北大平原的夜空。假在妈妈膝头数星星。“跑鬼子”。西北联大黑板上那幅中国地图，犹如雄鸡唱晓。镰刀斧头下的宣誓。炼铁炉里的火苗儿。书记大喊：“同学们快出来看苏联的人造卫星！”“书记，那不是卫星，是气象台放的高空探测仪。”“你行啊，你内行，你大学毕业！”1957年的酷夏。“朱聪颖，你和右派性质差不多，你的党籍被取消了。”……“朱聪颖同志，委屈你了。不过你没正式